

□本期聚焦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新华社记者 陈芸 谢登科 陈芳 彭致远 车晓蕊 崔峰 彭勇 蔡国照 刘大江 詹美嘉 孙闻 杜宇

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
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地劳动——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不容回避

这是一组令人称羨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作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周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他说，尽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愿意选择加班。这代表了不少员工的心态。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新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 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和“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新酬游戏常常被演逼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因为加班，来自甘肃陇南的陈俊在富士康工作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去过深圳市区一次。
正是他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

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娟说。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去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说，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代工”，就是为跨国大企业打工，按人家的设计，用人家的技术制造产品，然后贴上人家的品牌。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作者能赚取的就只有人力成本差。富士康，浓缩了代工者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路“高歌猛进”，扮演着主力军和突击队的角色，对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和扩大出口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毋庸置疑。

“但历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曾业松说，经济的总量与日俱增，但一味倚重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方式却依然如初。“规模经常世界第一、利润总是薄得像纸”，成为转型时期代工企业面临的尴尬处境。

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产品毛利率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仅为5.9%，一路下滑。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歇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一边是融入城市的渴求，一边是被疏离的窘困——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不容忽视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从到这里的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

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的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加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但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早已离不开这群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们不能再漠视这个群体的人生诉求了。中国目前拥有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

“但从认识、制度到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尽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现在需要的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破解矛盾，消除障碍。”北京大学王锡梓教授说。

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的获得，除了有赖社会的公平调节与人文关怀，也取决于自身的奋斗。

“必须让年轻一代懂得，任何成功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更多地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更多地融入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春风说。

在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时候，还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给予更多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一边是对“尊严生活”的渴望，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渴望尊严的群体；
与物质生活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归属感等精神生活上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前不久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杭州的440名外来农民工中，有66%的人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列在了“精神生活清单”的最前列。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巨大的反差折射，在这些“巨无霸”企业中，

“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党团群众组织存在‘覆盖盲点’——

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富士康今年5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

直到2007年底，富士康才成立工会，仅有的15名专职人员未能有效发挥维权职能。绝大多数员工游离在党团组织之外，得不到关怀和帮助。在深圳市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中，党团、工会组织被富士康员工列为“最少求助”的对象。

政府公共职能暴露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不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社会服务“跟进不力”——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却没有城市功能；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化需求。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 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发展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成员各方的角色定位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 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均衡化，重点加大对基础薄弱和问题突出领域的投入力度；

——加大工会维权力度，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加快培养社会工作者人才，健全社会工作组织；

……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体现实地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一个社会记忆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前进。

人们期望，“富士康事件”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永恒启迪。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局长，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案，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誉为煤炭大省山西焦煤领域反腐“第一案”。

郝鹏俊一审被判20年有期徒刑，而以其为代表的“官煤”式腐败，折射出焦煤领域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小局长”的大煤矿

官商科级的郝鹏俊数亿家财令人们震惊。专案组在郝鹏俊家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元；此外还有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的存款1.27亿元。

不仅如此，经蒲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郝鹏俊夫妻因逃税罪被处以巨额个人罚金，连同判罚成南岭煤矿的单位罚金，罚金总额高达2.6亿元，堪称“天价罚单”。

专案组的调查表明，这些惊人数字主要来自郝鹏俊的大煤矿。郝鹏俊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煤炭局党总支书记。这一连串与煤矿相关的职务，本该为国家矿产资源保驾护航，在郝鹏俊手中却成为私办煤矿的“保护伞”。

据蒲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时任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即开始经营蒲县成南岭煤矿。当时，郝鹏俊以办理采矿许可证为名，让其他人出资2万元非法购买克城镇张公庄村委一个叫后沟注煤矿的采矿许可证，编造谎言替换成蒲县成南岭煤矿。

2004年，调任蒲县煤炭局局长后，郝鹏俊更是肆无忌惮。

2005年8月，中纪委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以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限期撤资。

为掩人耳目，郝鹏俊与其堂兄、妻弟签订了一份借退股协议，并依此向蒲县纪委进行了退股申报登记。而在成南岭煤矿，他和妻子于香婷仍是“说了算”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拥有绝对的煤矿财产所有权。

“我没有投资，老板是姐姐两口子。我是他们雇佣在煤矿当法人代表，每月给我5000元工资。”郝鹏俊的妻弟于小红在法庭上说，煤矿的日常管理，包括用哪支采煤工程队、矿上的原煤销售到哪儿、什么时间拉煤、价格多少都由郝鹏俊夫妻决定。

乘着煤炭局局长的“东风”，成南岭煤矿规模迅猛扩大，由一个几千万投资的窑口子，发展成总资产5285万余元的大煤矿，职工达500多人。

“官煤”结合的利益链

煤炭局局长的身份给了郝鹏俊诸多便利。于小红出庭时说，每逢“风声紧”的时候，生产是停还是继续，于小红都要请示郝鹏俊夫妻，然后再转达给采煤工程队。

据蒲县纪委调查，2007年蒲县一次煤矿事故后，全县所有煤矿停产整顿，但成南岭煤矿却有禁不止，继续非法生产。

2008年2月到8月，成南岭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县有关部门下达《停止生产通知书》后，仍继续非法组织生产。期间，已于2006年改正煤炭局党支部书记的郝鹏俊还亲自安排该矿越界开采，在一些采区甚至进入村庄之下采煤，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隐患。

为追求高额利润，2006年至2008年，通过郝鹏俊的关系，成南岭煤矿采用夸大需求、重复申请等方式，超限额购买炸药65.5吨、雷管20万枚，并将这些危险物品藏到矿井下面。

对郝鹏俊而言，手中公职还是自己煤矿“开源节流”的工具。2003年5月，郝鹏俊借部分煤矿安装瓦斯检测设备之机，指使杨某购得13万元矿用监控系统，供成南岭煤矿使用。此笔款项经他签字后，一直由煤炭局垫付。同年11月，郝鹏俊代表成南岭煤矿与江苏徐州矿务局孟煤矿项目部签订合作开采合同书，12月，竟在蒲县煤炭局财务账户上支付给孟煤矿项目部10万元设计费。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发现，郝鹏俊还牵扯逃税、贪污等多项罪名。从2003年到2008年，成南岭煤矿通过销售原煤不开或少开增值税发票，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申报或不申报的手段，共偷逃税款1871万元。

谁给了“官煤”式腐败滋生的土壤

身为煤炭局局长，郝鹏俊为何能够大张旗鼓地经营煤矿达十余年？纪检、检察机关部分调查人员和一些学者认为，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是根源所在。

违规审批、入股办矿、挪用煤炭基金……随着焦煤领域成为山西纪检部门查处重点，因煤而生的各种腐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山西省纪委曾于2010年1月21日通报称，该省在2009年展开的焦煤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中，共清缴违规违纪资金145.82亿元，处理了1217名违纪党员干部。

据山西省纪委常委、监察厅副厅长邢顺喜通报，2009年山西省纪委查处了包括襄汾“9·8”尾矿库溃坝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中铝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冯其福借外国国有资产在内的一批案例案件。此外，近1000名违纪和4000多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了在煤焦生产管理和监管环节中的违纪违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田肇树认为，制约机制不健全是“官煤”式腐败的温床。一些“一把手”的个人意志膨胀，加上他们控制了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腐败很容易滋生。

一位纪检部门工作人员分析说，以郝鹏俊案件为例，他自恃“一把手”，在单位大权独揽，有恃无恐、骄横跋扈。制度却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完善，执行不坚决，使制度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对以焦煤领域为代表的基层官员监管缺位、监督无力，被认为是小官员、大腐败的重要因素。

蒲县纪委副书记孔宪民说，纪律监督乏力，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检查，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一位办案人员认为，郝鹏俊在长期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的反映举报很多，但却得不到及时查处，究其原因是在郝鹏俊与某些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了问题有各方面的人出面说情，甚至干扰调查，对案件侦查设置障碍。在这些“背景”的庇护下，郝鹏俊可以有恃无恐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此外，办案人员指出，隐蔽性也是焦煤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要因因素。郝鹏俊作为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为了掩人耳目，搞挂名法人代表，签订虚假退股协议，大笔转移资金，销毁煤矿经营凭证，种种手段都使其问题更具隐蔽性，例如在查证中发现，郝鹏俊以个人或公司等各种名义在银行的存款账户就多达76个。

□热点透视

一个煤炭局长的「官煤」腐败轨迹

——山西焦煤领域反腐「第一案」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

□热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

刘云佟 武敬原 勋